

商务印书馆：

民间出版业的兴衰

中国现代

知识群体

研究丛书



上海教育出版社

296
2

G229.226
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研究丛书

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

杨扬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策划

引驰杨庆
陈杨张安

印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 / 杨扬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1

(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研究丛书)

ISBN 7-5320-7118-9

I . 商... II . 杨... III. 商务印书馆-文化史
IV. G23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0) 第42464号

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研究丛书

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

杨 扬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 插页 6 字数 151,000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50 本

ISBN 7-5320-7118-9/G · 7274 定价:(软精)15.80 元

序

陈思和

记得好几年以前读过杨扬发表在《上海文化》杂志上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商务印书馆与 20 年代新文学中心的南移》，读了印象很深。那篇文章认为，20 年代新文学的中心从北京移向上海的过程中，民营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对《小说月报》的支持，等等。文章里有一段话让我读之不忘，大意是说：某种地区之所以成为文化中心，不仅靠几个作家、社团和刊物，还必须借助于某些有广泛社会影响和组织力量的文化机构。他进而指出：“五四”时期北京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学诞生的摇篮，是因为靠了北大，而 20 年代上海之所以能够逐渐成为新文学的中心，是与经济实力、社会影响都甚于北大的商务印书馆分不开的。我当时读了这段话第一感觉是其思路很开阔，立论也大胆：商务印书馆对新文学运动当然是有贡献的，但怎么能与北京大学相比？但再接着想想，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恰如鲁迅所说，京派近官，海派近商。北京大学不管如何激烈，总是有个京师大学堂的背景，足以号令全国学界，所以陈独秀在上海办的《新青年》不过是一家言论激进的民间杂志，一旦移到北大，就成了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到底是北大成全了《新青年》；海派则近商，在上海做事情先要讲究有没有经济实力，同样是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有了实力雄厚的商务印书馆做背景，《小说月报》就声势浩大，执文坛牛耳长达十多年，而创造社

FNFC 121

的背景是又穷又乱的泰东书局，《创造季刊》等都办不了几期就倒了，最后弄得人财两空。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务印书馆对新文学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再进一步而论，商务印书馆对整个现代文化建设的贡献虽是无可非议的，但具体到对新文学的贡献，恐怕主要就是在文学研究会一脉，而其他的文学社团——如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等等，也是各有书局背景的，当然实力远不及商务，却也共同支撑起20年代的文学格局。纵向地看，“五四”时期新文学借助了北京大学的准“翰林院”的余威拔地而起，20年代新文学是由多个文学社团提倡不同流派而遍地开花，到了30年代，新文学靠了商业性出版社出版的杂志和丛书来形成文坛的多元格局。如开明、生活、现代、文化生活、良友以及许多左翼小书店，几乎形成了不同的出版风格和文学风格。新文学的“中心”也实实在在地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而这个转移过程发生在20年代，商务、北新、泰东、光华等书局起到了中介的作用，而商务尤其重要。不能想象，如果不是文学研究会拥有长期稳定的阵地，如果不是《小说月报》扶植和培养了大批的年轻作家，新文学光靠几家朝不保夕的小书店和几个朝秦暮楚的浪漫文人能够布成什么气候？

关于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的关系研究，一直是我所关心的题目。尤其是商务印书馆那样的民间出版机构对现代文化建设的贡献和张元济先生的个人魅力，一直是我所认同的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榜样，所以，我对杨扬研究商务印书馆就多了一份热心。我原先一直以为杨扬的这篇论文是其著作的一个章节，直到昨天读了这部《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书稿，才知道两者并无关系。论文是他利用商务印书馆的材料做的综合研究，而这部书稿则是完整地描述了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上半叶的兴衰史，同时也折射了现代知识分子如何从庙堂里的士大夫群中走出来，在民间确定了新的工作岗位和价值岗位。这本书的叙述特点是脉络清楚，要言不烦。商务印书馆在近半个世纪里与许多文化名流、党政要员都有过往来，回忆资料档案也相当详尽，但杨扬没有纠缠于枝枝节节的历史掌故或书品文论，而是用简洁的叙述语言

描述了商务由兴到衰的历史过程，前半部分围绕了张元济，后半部分围绕了王云五，重点介绍了现代中国所遭遇的各种战争灾难于文化的致命摧残以及知识分子不屈不挠地抗争的过程。应该说，这是把商务的历史与精神两面都写了出来，成为一本了解商务印书馆、研究商务印书馆的基础性读物。

我这里所说的“基础性读物”，是怀着恳切的希望来提倡的。近年来现代文学的研究外延不断扩大，从文学史本身的研究，扩大到对文学与学术文化、教育出版等知识分子工作的关系研究，论述已经断断续续地出现不少，但具体的研究资料的整理和个案研究却很少。就出版研究为例，前几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宣布要推出一套“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研究丛书”，至今只有两种问世（刘纳的《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和孙晶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而其他的出版史料仅止于回忆录和论文集。现在杨扬的这本对商务印书馆的研究是我读到的第三种个人研究出版社的著作，对此我是非常支持和喜欢。以我私见，凡一项科研项目的确定，宏观的综合研究应该越少越好，而具体的问题研究、个案研究却越多越好，这就好像是建造大厦的基础材料，如果没有这些扎实的基础性的个案研究，就想建构什么理论框架或写什么“史”，简直如同儿戏一样。所以我所购买的专业书，大都限于具体的作家研究、问题研究和单位个案研究，这类书收集资料齐全，研究态度踏实认真，提供出来的有用信息就比较多；而对一些动不动就是这个“史”那个“史”的宏观研究，我一般总是敬而远之，因为我读过不少这样的宏观研究，大都是蜻蜓点水，于材料缺乏认真考辨，于理论大都似是而非，不读也没有什么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真是希望有更多的基础性读物的问世。

如果说，这部书稿的内容还可以作补充的话，我建议杨扬应该补充两个问题：

一个是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值得作一介绍。四角号码检字法是商务印书馆对现代文化建设的一大贡献。中国字有

象形特点，传统字典用部首检字法多有不确，给检字带来诸多不便，阻碍了文字的普及与文化的交流。所以，对汉字部首的改革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前任所长高梦旦身体力行作过研究，后来他发现林语堂对汉字部首改革有研究，就提出由商务提供津贴鼓励林语堂研究下去，王云五在约请林语堂的过程中突然自己对字改萌发兴趣，于是发愤在业余时间研究，半年以后抢先提出了四角号码检字法的雏形。经过修改推广，又凭借了商务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影响，很快就被普遍运用，在档案文献管理和图书资料检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整天在咖啡与幽默里消磨时间的林语堂终于一事无成，但这可能对林语堂也有刺激，后来他在美国倾家荡产去发明制作中文打字机，很可能与这一终身的兴趣有关。四角号码现在虽然已经不流行，但我总觉得中文电脑五笔字型的发明，应该是这一字改思路的延续。商务对现代文化的贡献，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应该是重重提上一笔的。

另一个需要指出的是商务印书馆的保守主义立场。商务印书馆作为民间出版机构和张元济作为一个庙堂里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为了能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生存，发展其私人企业，推动文化事业，是不能不采取妥协与保守的政治社会立场。但我觉得背后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就张元济先生而言，庙堂意识是根深蒂固地制约其一生事业。张元济先生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毅然弃官经商，以现代出版承传文化事业，但究其意识深处，仍然是一个在野的士大夫。他无时不与在朝者保持默契配合。在权力更替频繁的现代中国，张先生的事业始终欣欣向荣，正是与这一自觉有关。当然与在朝者的合作有时也会迷惑眼睛，如辛亥年的教科书事件，张元济面对革命风云无动于衷，对清政府的垮台毫无准备，结果造就了陆费逵的跳槽和中华书局的诞生；又有一次是民国时期拒绝出版反对派孙中山的代表著作《孙文学说》，其实也是庙堂意识作梗之一例。这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中也是相当有典型性的。杨扬也在书中谈到这两件事，并作了很有价值的分析，

但未能从中对中国民间所具有的天然保守性作出深刻的揭示。当然，杨扬有他自己的想法和理解，这篇序里无法讨论这样的问题，只能以后找机会再作论述。

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谨与杨扬共勉。

2000年8月11日



夏瑞芳



鲍咸昌



高凤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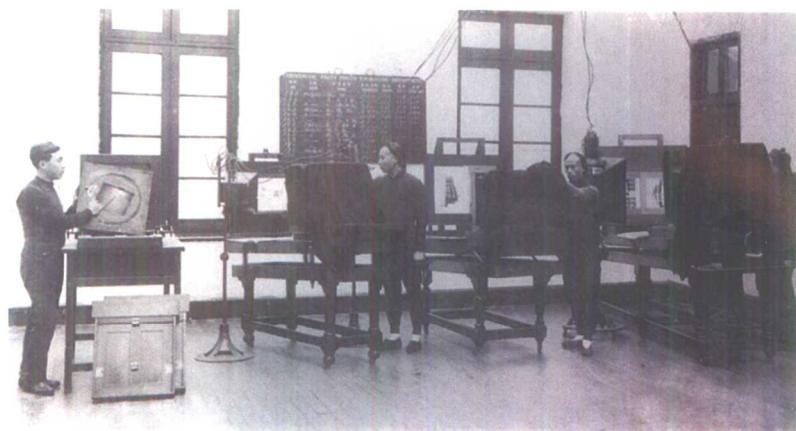
鲍咸恩



张元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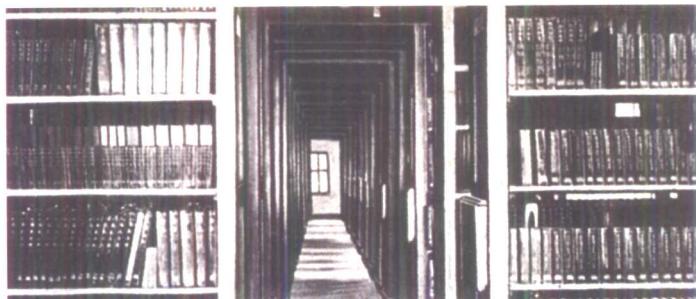
印有模



商务印书馆照相制版间



棋盘街(今河南中路)书业繁盛



东方图书馆书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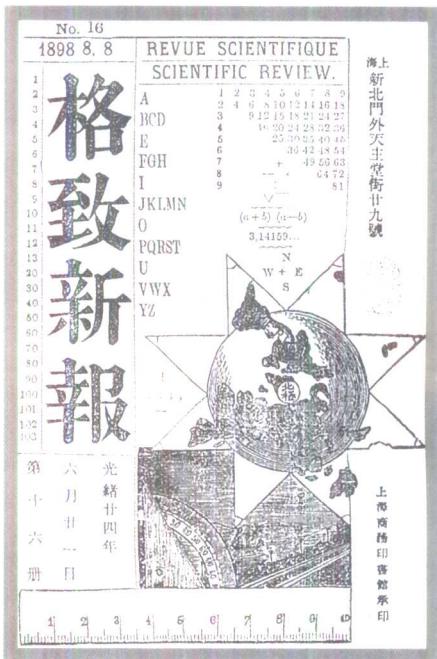


东方图书馆阅览室



东方图书馆全景

商务印书馆
民间出版
业的兴衰



商务印书馆早期出版物

目 录

序

引言 /1

第一章 艰难岁月 /5

- 一、最初的资本 /6
- 二、夏瑞芳、鲍氏兄弟及其他 /7
- 三、上海报业、书业的发展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10
- 四、商务的最初出版物 /14

第二章 现代出版业的诞生 /19

- 一、从翰林到出版家 /20
- 二、创建现代出版业 /24
- 三、对外合资 /28

第三章 商务印书馆与晚清文化 /37

- 一、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与晚清的教育 /38
- 二、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思想文化的传播 /47
- 三、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业的建设 /55

第四章 坎坷创业路 /67

一、橡皮股票风波 /68
二、中华书局的崛起与教科书之争 /73
三、夏瑞芳之死与商务印书馆的内部纠纷 /78
四、拒出《孙文学说》与新文化阵营对商务的批评 /83
第五章 走向辉煌 /95
一、迎接新时代 /96
二、《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与整理国故 /105
三、在激流中图生存 /111
四、战火与商务印书馆的复馆运动 /117
第六章 战火的洗礼 /129
一、大转移 /130
二、战时文化建设 /134
三、大后方时期 /137
四、贡献于大后方的文化事业 /140
第七章 战后商务印书馆 /147
一、王云五辞职 /148
二、公私合营 /154
附录 商务印书馆大事记 /159
后记 /173

引

言

中国文化在 20 世纪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形成了许多新的文化现象,这些新问题、新现象与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休戚相关,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不对这些新问题、新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话,就不能对 20 世纪中国文化有比较准确的了解,更不用说对 20 世纪中国文化进行深刻的反省了。

近现代出版业的兴起,是 20 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出版业的兴起,我们简直难以想象,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同样,没有 20 世纪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出版业的崛起,我们也无法想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否还会有茅盾、郑振铎、叶圣陶,是否还会有文学研究会,是否还会有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是否还会有所谓的“京派”;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是否还会有《新青年》与《东方杂志》有关东西文化之争,是否还会有《国学基本丛书》、《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初编、续编、三编的出版,是否还会有声势浩大的整理国故运动。当我们追溯所有这一切文化问题、文化现象时,我们无不感到,文化史的研究、文学史的研究、学术史的研究,绝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史的研究,而是比观念史研究更为丰富的研究。从这一意义上讲,出版史的研究,是我们研究中国 20 世纪文化问题的一个视角。

在研究近现代中国出版业时,我们必定首先会想到商务印书馆,这不仅因为商务印书馆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出版业,更主要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命运,是与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化问题的探讨结合在一起的。诞生于 1897 年的商务印书馆其本身就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如果不是近现代中西文化的交往,如果不是 1895 年甲午战争失败对广大中国士人形成巨大的思想冲击,如果不是戊戌变法失败,一大批士人流落民间,就不会有商务印书馆,也就不会有中国的近现代出版业。同

样,如果不是商务印书馆中的一批文化人有意识地扶持和推动当时的各种文化思潮,有意识地出版各种思想文化出版物,中国的近现代文化探索,无疑也要逊色得多。翻阅商务印书馆的馆史资料,人们会注意到,差不多所有第一流的现代学人,都与商务印书馆打过交道,如康有为、梁启超、沈曾植、郑孝胥、王国维、章太炎、罗振玉、严复、蔡元培、胡适、陈寅恪、钱穆、冯友兰、熊十力等,甚至一些重要的政界人物,如盛宣怀、孙中山、汪精卫、陈独秀等,也与商务印书馆有密切的交往关系。同样,影响近现代中国学术文化的许多重要著作、重要刊物,也都是由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发行的,如严(复)译名著、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金岳霖的《论道》、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等。因此,一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从一个侧面能够反映出中国思想文化的近现代历史,而且,从出版与文化史、文学史的关系着眼,将会使我们获得单单从文化史、文学史研究中所无法获得的新感受。